

有作用的聯絡網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

導言

第一屆世界華商大會是在兩年前，即1991年8月在新加坡舉行。今天，我們又聚集在香港，以更大的陣容參加第二屆大會。通過這類會議，我們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有益的聯繫。

照目前從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流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西亞和歐洲的移民情況看來，估計在十年內將有大批的華族企業家和專業人士散佈在各大城市，包括太平洋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悉尼、墨爾本、奧克蘭，以及紐約、波士頓、多倫多、倫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經濟網絡的聯繫有著相當大的潛能。凡是在外形上具有共同特徵的人，都會對彼此產生自然的感情。如果他們也具有共同的文化和語言，這種親切感就會加強，從而促進和睦關係，相互信任，為商業上的來往關係奠下基礎。

有目標的網絡聯繫

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已建立起貿易與投資網絡，注入科技和專門知識。佐·科金在他的著作《部落》中，說明種族、宗教和認同意識，如何在新的環球經濟中成為強有力的成功因素。

在這個環球經濟裡，少數民族已經把他們的弱點化為優點。他們把研究重點放在流亡國外的族群，而不是放在本國當權的族群：猶太人、英國人、日本人、華人、印度人都屬於研究對象。科金突出幾項易於辨認的價值觀念，如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對自助、苦幹、勤儉、教育和家庭的信念，以說明這些價值觀如何促成這幾個不同族群的成功。

科金補充說：“隨著20世紀即將結束，英美霸權面對亞洲族群興起的新挑戰。這項發展可能是新世界創立以來影響力最深遠的區域轉變。全球化的亞洲部落在這個時代興起，具有兩大先決條件：一個全面性跨國經濟的興起以及通信運輸科技的突飛猛進。”

“新的電信與運輸科技（主要也是由英美人士所創），使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亞洲族群能保持聯絡。他們經營業務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傳統的、高度共識的亞洲營業形式，從日本人的‘系列’公司到印度人的聯營家族公司以至華人的家

族網絡等。這些亞洲人的商行，為資本主義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透過傳真機、電話和電腦直通聯繫的使用，‘小東京’、‘小旁遮普’或唐人街在世界各大城市紛紛湧現，從倫敦到新加坡都有，它們不僅是種族村落的奇妙復制品，而且也成為跨國經濟網絡的一部份。”

網絡聯繫早在國際直撥電話、傳真機及航空旅行出現之前已經存在。在早期的南洋（即東南亞），貿易和投資是在華族同鄉之間進行，例如米業，早期是由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潮州人所控制。現在有了國際直撥電話、傳真機和飛機，網絡聯繫變得更加快捷有效。但是，今天最令人矚目的網絡聯繫例子卻是在中國。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日本和西方各國都阻止投資家和旅客進入中國。在這個緊要關頭，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華裔商人卻捉緊時機，增加他們在中國的貿易與投資，從中國日益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中獲益。在他們取得成功之後，東南亞的華裔商人也趁機加入。事過三年，也就是1992年，這方面的成績令世人驚嘆不已。中國的經濟增長達到每年12%，結果使美國人、歐洲人和日本人恢復了對中國投資的興趣。

一路來，他們對投資中國是否明智，都存有疑慮。他們經常提出的投訴是指中國沒有法治，在條例規則方面缺乏透明度，對原料和能源實施雙重售價制，以便在外國人和本地人購買時有所區分。讓我引述兩本著作中的評語，以了解西方人士為甚麼會認為中國的法律制度是薄弱的。

在美國出版的《中國民事與商業法》一書，作者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受訓畢業的律師鄭瑞恒，曾經在美國修讀高級學位課程。他在著作中的第一頁這樣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時，廢除了壓迫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政權所制訂的“一切法律條規和整套司法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自己帶來艱巨的任務，從新建立一套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兼具的全新法律制度。”他們並沒有時間推行這項任務，直到鄧小平在1978年實行門戶開放政策，規定商業法律必須通過為止。

屬於曼徹斯特商業學校的中國事務研究單位的奈傑爾·坎貝爾和彼得·艾林頓在他們的著作《中國商業策略》中寫道：

- (i) “在強權統治時代，帝王權力伸延到中國各個角落。行使這種權力時非常武斷、非常殘忍，官吏既是主控官也是法官，從來沒有另外設立一個司法制度。因此，庶民從不希望法律為他伸冤。在傳統上，他會不顧法律，擅自處理問題。現代的同等情形是地方官僚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中央條規，以配合其本省本市的情況。”（第9頁）
- (ii) “家庭關係和緊密的農民社會帶來了個人關係的價值觀。在糧食短缺、巴士擁擠或工廠缺鋼的情況下，個人關係是很重要的。因為個人關係是消除混亂的潤滑劑。個人關係是從家庭、鄉村同學各方面建立起來的，而‘關係’就是指個人關係的資產價值。”（第9頁）
- (iii) “總而言之，中國的法律是靈活的，任由政府官員根據自己的理解去闡明解釋，西方的法律則很嚴謹，只有法庭才能加以闡明解釋。”（第24頁）

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華裔所做的，是向抱著懷疑態度的世界證實，基於共同語言文化的‘關係’，可以彌補法治上和條規透明度上的不足。這種‘關係’能力，至少在今後20年內有存在的價值，直到中國根據法律建立起一個有足夠透明而又明確的制度，以滿足外國投資人士的需要為止。

在今後的10到20年，或是在更長的時間裡，東亞的經濟會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區增長得更快，而中國將是它的動力源泉。儘管中國國內政治不穩定，行政和法律上都有缺點，中國仍舊最具有吸引力，因為那裡的勞工成本低，城市內工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國內市場龐大，政府官員親和投資等等。

即使增長率只是目前的一半，中國也會在20年後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歐美和日本的大投資家恢復了對中國的興趣。這些工業國的投資價值將使海外華人的投資價值相形見绌。然而，中國不會忘記，香港和台灣的華裔在1898年到1992年之間證明了如果有良好的‘關係’，在中國投資是有希望成功的。

東南亞的敏感問題

東南亞一些地方傳媒，對這個問題深表關注。印尼的《獨立報》在1993年7月1日寫道：“資金不斷外流，以致妨礙我國的經濟發展，絕不是不可能的事。”其他報章，眼看國內的華人不要把從本國賺來的錢投資在本國，反而拿去中國的家鄉投資，不免對他們是否忠於本國表示關注。在這個競爭爭取投資的世界裡，這些華人所在的國家非常需要這筆資金。

伯克利東亞研究所的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是一位熟悉東亞事務的美國人。他曾在今年8月10日在印尼峇厘島就中國實行現代化所產生的影響發表演講時說道：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目前‘大中華’一詞開始流行，含有中國、香港、台灣、有時也包括東南亞和其他各地海外華人不斷擴大經濟交流的意思。這種不斷擴大經濟交流表示政治團結之說固然是項錯誤，但是華人社會單獨或透過某種形式聯合取得經濟進展，會使一些主要的東南亞社會種族關係惡化，卻是無可置疑的。目前，由於這些國家的政策和一般經濟進展，這些種族關係倒相當融洽。不過，種族關係永遠是微妙的。種族問題是政治上的一個長期因素：它雖然可以高明的政策來抑制，但卻永遠不會消失。中國經濟勢力崛起的幽靈，勢必使種族問題繼續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

這個危險不可以低估。任何亞細安國家與中國交惡，這個國家的華人在中國投資，不免會有對本國不忠之嫌。有些華人恢復了他們的宗親關係，在中國做慈善事業，如建學校、蓋醫院、辦大學等。這樣做雖然可以搞好關係，獲得優厚的投資條件，但是，當一國的人民掀起反華情緒而把矛頭指向當地華人時，他們就會把資金永遠流向投資收益最高之處的這個簡單的道理，置之不理。

來自這些‘敏感’國家的華人，不能因為在中國投資而減少了在本國的投資。他們最好也利用自己同中國的‘關係’，來促進中國和他們本國的貿易，同時，也增加中國在他們本國的投資。這是有可能的事，事實上在十年內就可以辦得到。

中國可以利用同東南亞各國華人的聯繫，在

能源（煤氣、石油）豐富、勞工成本低廉的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投資，盡量提高在工藝和資本投資的收益。有些工業，如鋼鐵業和化學工業，並不十分需要精進的技術，因此，亞細安國家可以利用中等的工藝來搞這些工業以獲得收益。這類聯營企業具有兩個競爭優勢——其一是中國技術成本低，其二是廉宜的天然氣供應給能源密集工業。

今年6月，山東省省長訪問馬來西亞，耗資2億元人民幣同當地人在關丹附近的格平工業區合資開設一間軋鋼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廠初期將生產鋼板以供出口，過後再生產其他鋼件。如果在亞細安國家能多設這類聯營企業，就可以消除單向投資的印象。中國在香港的多項投資，就是雙向投資的最好證明。當然，這和兩地相距不遠的特殊因素不無關係。

更有效的網絡聯繫

要使網絡聯繫有效地運作，就必須加強它的系統化。我們可以編制指南，列出姓名、個人履歷、商業背景，使任何人在需要適當的接觸人或夥伴時，都可以立刻獲得參考資料。

這類指南也應該提供人格和信貸擔保的資料，包括個人的銀行擔保。如果這些資料能儲存在電腦資料庫內，並且能夠通過國際網絡（Internet）或大學網絡（Bitnet）來取得，那就更加理想。

美國華人在電腦軟件領域中人才濟濟，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目前，中國充滿投資的機會，要和這些投資機會掛鉤，最好是通過香港人、台灣人、泰國人、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來進行聯繫。經過一個短時期後，中國本身的商人就會通過多元化，把風險從香港擴大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西亞、歐洲和東南亞各地。

網絡聯繫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大家大可不必為了要通過互通訊息以爭取最大利益的機會而耿耿於懷。其實，盎格魯撒克遜人這麼做，猶太人這麼做，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也都這麼做。

網絡聯繫使結合後的世界增值

科學工藝將繼續結合整個世界，使整個世界趨向一個環球市場。這樣的一個世界將加強盎格

魯撒克遜人、猶太人、印度人、回教徒、黎巴嫩人、日本人、韓國人或中國人的宗族網絡角色，成為傳播資金、技術、專門知識的催化劑。隨著中國以外的華人社會教育經濟地位的提升，他們將增加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源。他們的知識、聯繫和財力的結合，加上中國人口和天然資源的經濟潛能，將會帶來可觀的經濟增長。

哈佛大學商科學校的華裔美國教授高健曾經向我的內閣同僚楊榮文提起這件事，把華人社會如何利用對當地的專門知識形容為“知識套匯”（Knowledge Arbitrage）。儘管有了電腦和傳真機，並不是所有的學問都能編集成典。許多學問都與文化有關，例如中國、日本、印尼等社會的‘關係’。那些有能力套匯不同社會之間學問差距的人，將能從中獲益。華人企業家，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香港的李嘉誠等，都是溝通這些文化的佼佼者。舉個例子，他們一方面把日本的技術引進印尼或把美國的技術引進中國，另一方面卻把原本的研究工作留給美國人、歐洲人和日本人。為甚麼海外華人企業不專於發展產品或技術，而只願意經營特許權和知識，這點令美國商科學校百思不解。原因是他們有多元文化的優勢，在把發展中的經濟體與工業化的西方結合時，更加有利可圖，使得他們的投資更加有價值。

隨著時代的改變，新的情況出現了。例如在美國、歐洲和澳大利西亞的大多數華人，雖然在文化上還算是華人，但他們卻不會講華族的語言。即使在東南亞，除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以外，華人在本國的教育體系裡並沒有學習母語。雖然如此，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卻可以利用英語，參雜一些方言，有效地建立起網絡聯繫。

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以能適應入籍國家的語言文化見稱。他們有講幾種語言的能力。他們講入籍國家的語言，自己的方言或華語、經常也講英語。西方教育，就好象一條珍貴如金的線，把中國以外年輕一代華人企業家和專業人士聯繫起來。他們大多數接受英文教育，對中國大陸文化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成為多元文化經濟價值的例子。這種多元文化來自與其他文化共存，汲取其他文化的優點。

另一方面，海外華人在成功的時候，必須慎

防華人沙文主義。正當中國繁榮興盛時，這一點顯得更加重要，因為中國的成功，會形成中國支配本地區的恐懼感，尤其是當中國被視為爭取投資的競爭者，而不是促進區域繁榮的伙伴時。

對本國的忠心

我們大家同屬華族。由於同宗同文，我們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我們之間很容易建立起互信互賴的密切關係。但是我們必須誠實，認清我們最終的效忠對象，應該是入籍國而不是祖籍國這項事實。

如果我們不這樣想，並且認為自己同其他國家的華人以及祖籍國之間共同點，比和各自入籍的國家人民之間共同點還要多，那將是不切實際的。在利益不一致，情感關係不足以克服立場不同時，這將導致悲傷的後果，也會造成我們同本國非華族人民之間產生誤解，發生摩擦，即使像新加坡這樣的華族人士佔大多數的國家，也不例外。

我們的祖先來自中國，經過了兩三代人的時間，我們已經在出生地落地生根。我們同本國，而不是同中國或祖籍國利害攸關。泰國華人是泰國人，他最終希望泰國會繁榮，這樣他在泰國的資產才會增加，他的子女在泰國的前途才有保障。新加坡華人、印尼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和菲律賓華人也是這樣。他們可能經常到中國投資訪問，但很少人要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家園。

過去兩年來，我嘗試探討冷戰後的世界局勢，以找出這些局勢對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有甚麼啟示。我的結論是：如果新加坡企業家不參與這個時代的最大變化，不參與東亞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工業化和現代隊伍，那將是一項錯誤的

決定。如果我們不利用華族網絡擴大和掌握這些機會，那將是很愚蠢的。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如泰國和馬來西亞，也都抓緊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我的總理吳作棟先生也注意到，隨着印度解除管制，開始實行自由市場制度，新加坡也可以通過本地的印族商人取得類似的網絡聯繫機會。在南非的政治問題獲得解決後，印度聯繫網將能提供在南非的商業機會。這是過去新加坡興地族商人擴大聯繫的新版本，當時他們同世界各地，從南太平洋到印度、巴基斯坦、東非到英國的同族商人聯繫，除了做生意的目的之外，也是為他們的子女尋找配偶。

在未來的10到20年內，取得最高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將是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展望未來，新加坡決定改變移民政策，在新加坡建立以新加坡為基地的各種不同族群，利用他們世界性的聯繫網來擴大我們的範圍，增加我們可以掌握的機會。因此，我們已經增加華人，尤其是香港移民的流入，他們能和世界各地的華籍香港人取得聯繫。我們也積極物色和吸收印度專業人士和商人。在過去兩年裡，已經有一千多名這類人士在新加坡定居。我們也同樣歡迎本區的馬來西亞和印尼專業人士和商人，雖然他們的人數相對地比較少。我們也正在吸引巴基斯坦和阿拉伯的專業人士和商人到新加坡定居，他們將能成為新加坡同阿拉伯和回教地區的聯繫。阿拉伯商人很容易和本地的回教社群同化。

我們在這裡聚集，是因為我們在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經驗，而交換經驗，對大家都很有益處。我們當中有人會再度相見，因為相見對彼此都有好處。這就是所謂有效的網絡聯繫。